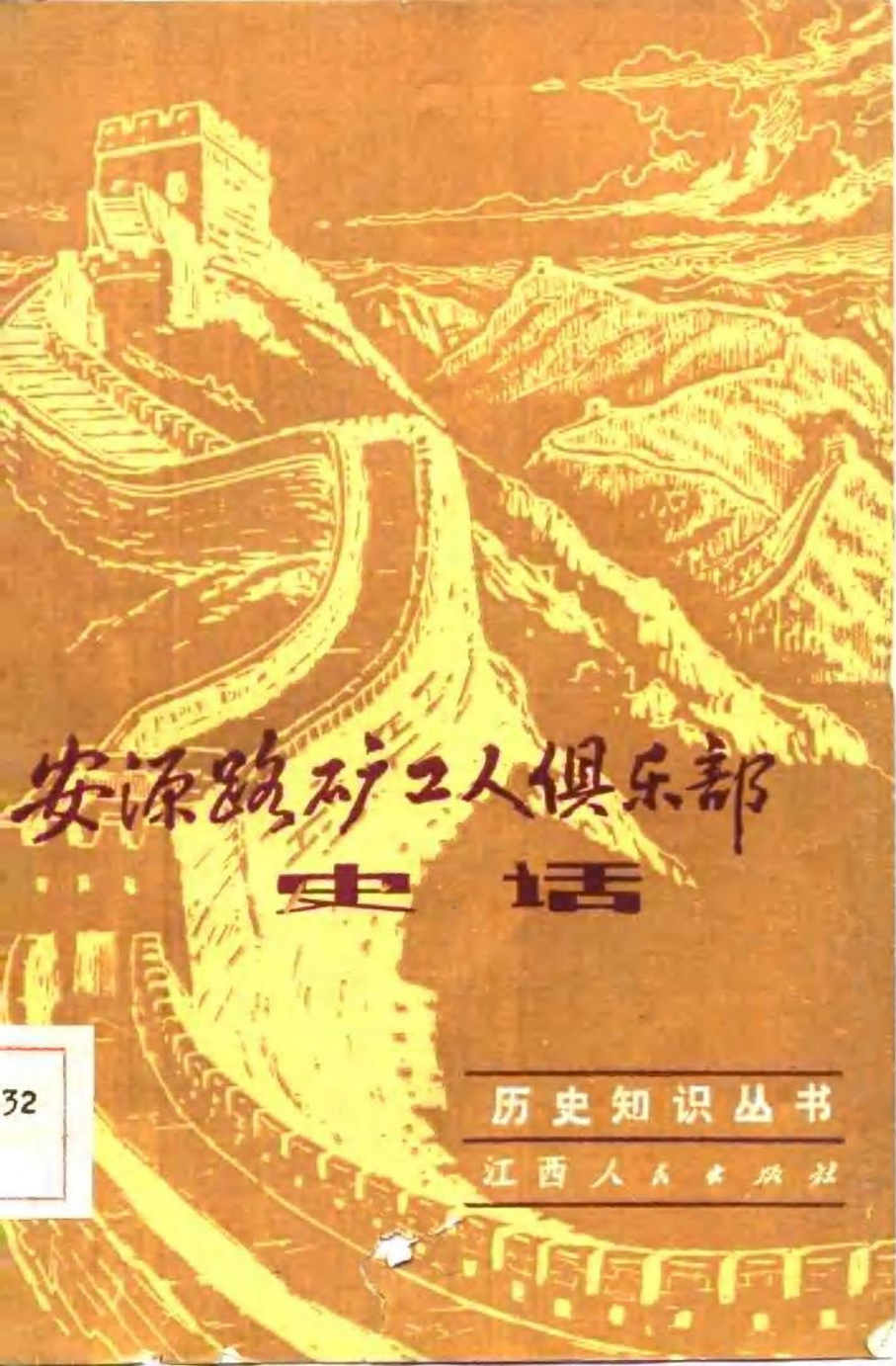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史话

32

历史知识丛书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历史知识丛书

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史话

炎冰 编写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第四通路铁道东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.375 字数5万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000

统一书号: 3110·105

定价: 0.23元

说 明

安源煤矿工人运动有着较长的历史，斗争内容十分丰富，限于篇幅，本书不可能详尽叙述。这本小册子，只是根据有关资料，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前后的主要斗争活动为线索，概略地介绍安源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从自发斗争到自觉革命的历程，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、李立三、刘少奇等同志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。以此对青少年进行革命历史知识和革命传统教育。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，书中可能存在不少缺点或错误，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者 一九八二年九月

目 次

黑暗的年代 不屈的斗争·····	(1)
拨开漫天迷雾 播下革命火种·····	(12)
团结就是力量 工人有了靠山·····	(23)
从前是牛马 现在要做人·····	(35)
扩大胜利成果 经受严峻考验·····	(48)
革命星火扑不灭 前仆后继永向前·····	(63)

黑暗的年代 不屈的斗争

安源煤矿，现在称为萍乡煤矿。它位于江西省西部的萍乡市境内，与湖南省毗邻。由于安源煤矿开发很早，安源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重要工业城镇之一。

安源的煤炭，不仅蕴贮丰富，而且煤层很厚，它的开采历史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代。到了清朝，安源一带的民间采煤，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：光绪二十五年左右，被开掘的土井达到二百六十五个，采掘最深的达三百九十公尺，有的垂直深度达二百四十公尺；所产的煤，除了供应安源萍乡一带的需要外，还有一部分经销湖南长沙等地。

安源煤炭的质量也很好，可以炼出优质焦炭。因此，在旧时代，安源煤矿也和我国其它工业一样，早就为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分子垂涎并大肆掠夺。

一八九〇年（光绪十六年），清朝的洋务派头子、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筹建官办铁厂。五年以后，厂房建成；与此同时，大冶的铁矿也开采出来。于是，开炉冶炼钢铁。可是，由于事先没有就近筹备燃料，以至必须万里迢迢地从德、日、比利时等国家高价进口焦炭进行生产。后来改用土煤，由于炉温不足，又经常发生矿液凝结、损伤炉体的事情。结果，从建厂直到一八九六年的七年中，竟没有炼出一炉合用的钢铁，而耗费的银子，却已多达五百六十多万两。

因为亏空太大，这个官办的铁厂办不下去了。当局只得

以“招商承办”的名义，把企业让给大买办盛宣怀。

盛宣怀一接管企业，就聘请德国的“洋矿师”到江苏、安徽、江西等省沿长江一带勘察煤源。两年以后，即一八九八年（光绪二十四年），“发现”安源有蕴藏丰富、硫轻灰少、适于炼焦的优质煤炭。盛宣怀便在奏请朝廷批准以后，从自己把持的官僚企业中筹集一百万两银子作资金，派亲信张赞宸为总办到安源，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圈划矿界，吞并土井，霸占田地，招工采煤。第一年就生产煤炭十万吨左右。

然而，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，离开了帝国主义是不能生存的。一八九九年（光绪二十五年），正当德、英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长江流域的利益，拚命扩展势力的时候，盛宣怀同德国的礼和洋行搭钩，先后同它签订了借款四百万马克的合同，并同意让德国人为矿山提供所需的全部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。这样一来，德帝国主义不仅以债主的身分攫取了巨额借息，而且通过垄断矿山机器设备和技术指导权，达到了控制这个企业的目的。

此后不久（一九〇四年），日本政府又乘汉阳铁厂和安源煤矿再次寻求借款的机会，以比德国略为宽松的条件进行经济渗透，向盛宣怀贷款三百万日元。从此，日本凭债主的权利，对安源煤矿插手日深，直至逐渐排挤德国的势力，取得垄断地位。从一八九八年起到一九二五年止，德、日帝国主义凭借特权，从安源煤矿掠夺的优质煤炭，累计达一千四百多万吨之多。可见，从一开始，安源煤矿就处于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双重垄断之下，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财富的一个据点。

一九〇三年，为运输煤炭而修建的株（洲）萍（乡）铁路通车。从这个时候起，安源出产的煤便主要通过株萍铁路

外运，安源路局、矿局亦被通称为“安源路矿”；一九〇八年，安源煤矿矿井建设道也完工了。就在这一年，由安源煤矿和湖北汉阳铁厂、大冶铁矿合组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成立，并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，由盛宣怀任总经理。安源煤矿的年产量这时已达到四十万吨，除供应汉阳铁厂的需要外，还有剩余的出售；但是，另一方面，随着生产的发展，汉冶萍公司的债台更加高筑：据一九〇九年估计的数字，该公司企业资金为四千万元，其中商股连同产品增益的积累只不过千余万元，另外三千多万元便全部属于日本债款。由此可见，名为总经理的盛宣怀，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代理人而已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帝国主义列强因忙于战争，不得不暂时放松对中国的侵略；因为战争的缘故，国际市场上煤铁价格猛涨，各方向汉冶萍公司的订货大大增加，客观上造成了汉冶萍公司发展生产的有利形势（以煤炭生产为例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，安源煤矿日产三千余吨，年产九十五万吨。这是安源煤矿历史上产量最高的时期）。然而，汉冶萍公司当局并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，认真对企业加以整顿，用所得利润逐步偿清外债，稳固产业根基，相反却又添借了大小九笔借款，以至使日本对汉冶萍公司的债额达到四千六百万元的高峰，从而形成一种不是向日本出售产品，而是因债务关系蚀本向日本供给产品的局面。故此，日本政府在臭名昭著的“二十一条”不平等条约内，甚至明文规定：汉冶萍公司为两国合办事业，如未经日本国政府同意，所有该公司的一切权利产业，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

来，美、日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也进一步扩张。为着争夺势力范围，它们分别操纵中国的各派军阀，连年混战，对安源煤矿的生产造成极大破坏。如一九二〇年六月，几派军阀同时进扰安源，抢夺铁路，使交通被破坏八十多天；一九二一年二月，盘据在江西的军阀到萍乡拉伕，抓走不少矿工；八月，湘鄂军阀混战，使交通中断两个多月；一九二二年六月，黔系军阀过境，勒令安源煤矿供应军费，又强迫拉伕，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安源煤矿更加入不敷出，产品仅够抵押外债的利息；这时的汉冶萍公司，名为“合办”，实际上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土上开办的一个联合企业。

随着安源煤矿的开发，安源煤矿的产业工人由最初建矿时的三、五千人，逐渐发展到后来的一万三千多人。在帝国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重重压迫下，他们的劳动条件极端艰苦，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，而且全部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。下井就等于进了地狱。在距离地面几百公尺的地层深处，由于没有通风设备，温度常常超出人的体温，工人在井下大汗如淋，闷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；而且井下的瓦斯、一氧化碳等毒气浓度很大，工人中毒，甚至窒息而死的情况时有发生；挡头低矮昏暗，工人进去挖煤运煤，只得嘴里咬着油灯，手脚爬行。煤矿当局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，对于生产上的安全设施、工人的病伤医疗等，从来就不加闻问。更加令人发指的是，每当发生井下塌方、瓦斯爆炸和冒顶等严重事故时，煤矿当局往往不但不采取抢救措施，反而强令堵塞巷道、封闭井口。据统计，自安源煤矿开办以后的二十年间，每生产一万吨煤，平均就有四、五个矿工死亡。

在经济上，安源工人受着资本家及其爪牙的敲骨榨髓的

残酷剥削，生活痛苦不堪。这里只略举几个方面的例子，便可见一斑：

明抽明吃暗扣税。煤矿当局雇用工人约一万三千多名，其中窿工六千人、机械工一千多人，其余则分散在洗煤、炼焦和运输处，还有各项杂工。矿方规定：除窿外一部分机械工及窿内杂工等是以日点工外，其余都是包工。因此，工人大都在包工头手下做工。而工头向矿局包下工程以后，只将其中的几成工钱发给工人。譬如，矿局规定井下工人的工资为每天铜元五十七枚（含银洋二角七分），但经过工头克扣以后，实际发到工人手上的只有二十六、七枚铜元（仅合银洋一角二分多）。即便是这点少得可怜的血汗钱，工头还要巧立名目，明抽暗扣，再从中夺去一部分；手段更辣一等的工头，则把向矿局领来的全部工资存入银行，故意一再拖延发放时间，额外捞取存款利息。那时物价飞涨，纸币贬值，工人们经常是等钱拿到手，早已贬了值。因此，工人们称工头发工资是“明吃明抽暗扣税”。

吃尾子。矿局曾作出这样的无理规定：工人的工资凡是在一元以上者，只发给整数；不足一元者，才按数付给铜元。工人为了凑成整数，只得不顾疲劳，尽可能多进几个班，以免工资尾数被他们扣去。但是，工头为了获利，却拿着皮鞭阻止这些工人加班；就是有人侥幸溜进班，工头知道后，也要拉他出去，有时还给扣上“违反矿规”的罪名，轻则挨鞭子，重则坐班房。

吃点。所谓吃点，就是包工头向矿局承包工程时，虚报点工人数。例如，工头向资本家报三十个人出工，而实际上只点二十个人出工，这样，他就从中多捞了十个点工的工钱，遇到挡头煤好出的时候，工头见有机可乘，就再增报点工人

数。既然报上去的人数增加了，出煤量也就得相应增加，而干活的仍是原班人马。结果是工头捞足了油水，工人累得半死。

帮工送礼。工头除了在工资上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外，还在工人的一点点工余时间上打主意，任意摊派劳务。有时工人刚刚下班，就被工头叫去给他干私活，诸如拉烧煤、劈柴火、洗东西、担水之类；有一个叫何胡仁的家伙，竟独出心裁地想出个“搬家受礼”的新花招。他为了多收工人的贺礼，有时竟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搬家。每次搬家他都派爪牙四处通知所属工人，强迫他们送钱送物，道贺他的“乔迁之喜”。别的工头见他收了不少礼物，心里痒痒，也都一窝蜂地学起样来。一时间，工头们搬家受礼的事闹得不亦乐乎。

从嘴里揩油。这是对工人在伙食上进行剥削的一种方法。守房和监厨（即工人集体宿舍和伙食管理员司）就是经营这种剥削的专员：在煤矿餐宿处用膳的工人，每月还要从工资中扣除伙食费银洋两元。厨房供应的伙食，质量既差数量又少，而守房和监厨竟把克扣下来的菜食转手再卖给工人，让工人另外掏钱买。不过，工人们难得加菜，因此，守房和监厨大都将克扣下来的饭菜转卖到外面去，叫作卖“洋饭”。仅这一项剥削，守房和监厨每人每月就可以弄到六、七十元“外花钱”。

发矿票开支票。矿局常以经济困难为借口，滥发矿票，充抵工人的一部分工资。而工头领到工饷后，又总是把银洋尽量留给自己，把矿票发给工人。所以，工人所得的矿票数额比重就更大。矿票只限于安源地方使用，一块钱矿票要当一块钱在市上交易，非要再补几分水不可；由于物价猛涨，

矿票便更加贬值，一块钱面值的矿票非得补水三、四角不可；到后来，矿票越发越滥，矿局又只管发不管收，弄得市场上也没有人敢要了。萍乡有个大官僚地主就曾借此渔利，用两角钱兑换一元钱矿票，再以矿票向矿局兑钱，因而发了大财。

矿局发放矿票大获其利，这还不算，后来又变换了一个开支票的新花样。即矿局除了发给工人最低限度的伙食费以外，其余的工资则全部开支票发给工人，矿局并宣称：拿到支票的，待矿局经济好转后立即兑清。但是谁都清楚，这种空头支票无异于“阎王赖帐”，根本没有兑现的希望。

除此之外，安源工人还要受银行资本家、高利贷者、商人的种种剥削。

剥削阶级为了保持统治地位、麻痹工人的斗争意志，还千方百计地从精神上对工人进行摧残，在安源大量开设赌场、烟馆和妓院，并不择手段地拉工人下水；又招徕一些和尚及帝国主义国家的牧师、神甫等，在安源设立了十几所天主堂、中华圣公会、福音堂和庙宇；帮会也很多，仅老街筲箕街就有四个自成体系的帮会组织。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，矿局还特设司法课。监狱里经常非法地关着成百名所谓“触犯法规”的工人；以流氓地痞组成的矿警局，成立了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区矿警队，严密监视着工人们的一切活动。这些家伙平时作威作福，鱼肉劳工，对劳工轻则拳打脚踢，重则关监动刑。一九〇六年有矿警三百人，到一九一六年矿警便增加到九百人，几乎每十个工人就要被一个矿警监视；矿局还勾结官府，派军队驻扎萍乡、安源（通常情况下，长年驻着一个团到一个旅）。一九二六年以前在萍乡设立的“赣西镇守使署”，就是专门调配军队镇压工人

的机构。

株萍铁路工人，共有一千一百余人，劳动多系点工制。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，和安源煤矿工人没有多大差别，同样受着资本家和工头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，生活十分困苦。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；压迫得愈深，反抗也愈强烈。安源路矿工人在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之下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为了求生存，于一九〇五年（光绪三十一年）五月，群起提出发清欠饷和反对“罚扣”工资的要求。帝国主义分子和买办资本家对工人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。几千工人忍无可忍，便于十七日下午聚集起来，由段桂材、伍锡材领头，首先打坏公事房（总办公室）和司爷的宿舍，然后又把“洋屋”包围起来，高呼“打洋鬼子”，蜂拥而进。买办资本家便一面用火车把帝国主义分子送往湖南醴陵藏起来，一面从萍乡城里调来大批军队守卫“洋屋”。这次斗争，历时三天，虽然后来终归失败，却显示了安源煤矿工人团结斗争的力量。

接着，在一九〇六年六月，安源工人为反对矿局将三班生产制改为两班生产制，举行了罢工。由于当局事先得到消息，作了充分准备，罢工遭到失败。

同年十二月，爆发了有六千多安源工人参加的萍（乡）浏（阳）醴（陵）起义：这年的春夏之交，长江中游发生大水灾，株洲被洪水淹没，许多安源煤矿及株萍铁路工人的老家都遭了灾；加上当时江西和湖南、湖北地区普遍歉收，奸商乘机囤积粮食，粮价一日数涨，工农大众没有饭吃，各地灾民纷纷向萍乡这边涌来。一时间，从株洲到萍乡，沿途到处是灾民，遍野是死尸。清朝政府竟置人民疾苦和生死于不

顾，对此不采取任何措施；株洲铁路转运局因怕群众起事，曾行文到安源煤矿要求拨款救济。总办张赞宸不仅断然拒绝，反而藉口煤炭卖不出去，要缩小企业范围，开除了一批工人。安源工人非常气愤，便一齐向矿局请愿，要他们救济灾民。

在这前后，有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会员蔡绍南（萍乡人）等革命党人，在萍乡上栗市、桐木一带秘密活动，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；在醴陵，则有革命党人马福益等人的宣传鼓吹。马福益到过安源，曾发动不少工人参加以他为首领的洪江会。光绪三十一年，马福益被杀害，洪江会号召报仇雪恨。

就在萍乡、浏阳、醴陵一带的工农劳苦大众因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，已有起义的思想和组织准备的基础上，安源煤矿工人在八方井工人张秋生、东平巷工人周成远、温长发、朱德生等召集下，集结起来，组成约六千人的一支队伍，离开安源，与萍乡、浏阳、醴陵三县的革命党人和农民群众联合举行起义。起义军用白布或青布做包头，手执马刀、梭镖等武器，和敌人进行搏斗。由于这次起义是在孙中山先生的“建立民主共和国”、“平均地权”等革命纲领的宣传影响下发生的，所以明确地提出了“建立共和，平均地权”的口号，矛头直指腐朽的清朝政权。在萍乡、浏阳、醴陵交界处的麻石，起义军把清朝廷驻军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清军守将因骑马逃得快，才保住了一条命。在起义军中，安源工人表现得特别英勇。

同时，驻在安源煤矿的清朝官兵也被起义军杀得落花流水。总办张赞宸和萍乡县知事慌了手脚，一面出钱买通帮会头子，利用帮会势力出头护矿；一面急电清廷。清朝廷便从

湖北、南京调派军队，前来镇压。在清军尚未开到之前，矿局在工人的催促下，不得已和湖南抚台共同拨了一点款子，赈济灾民和株洲的工人，借以暂时缓和民愤。但是，到今年十二月，当湖北的清军开进安源后，当局就立即暴露其凶恶面目，与清军一起，对安源一带的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，大批屠杀起义军的领袖人物，并把工人喻桂林、朱德生抓走（直到辛亥革命以后，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，颁布了大赦令，他们才被释放出来。后来，窃国大盗袁世凯当了大总统，喻桂林、朱德生两人又被重新抓走）。

萍乡、浏阳、醴陵起义因敌我力量悬殊、各处起义军组织的行动不够一致，到第二年一月，大多数都被镇压下去。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，却给了清朝廷一定打击，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。这次起义，是安源工人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，最早参加的一次革命武装斗争。

一九一三年五月，为反对工头的残酷剥削，安源工人还发动了一次向工头清算工资的斗争。因当时正值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黑暗统治，官僚买办资本家害怕因此而酿成武装暴动，急忙调兵遣将进驻工人宿舍，才迫使斗争暂时中止。

同年十月，德国矿师西礼夫特滥施淫威，无理拷打工人易瑞林，激起安源工人的民族义愤，群起抗争，终于迫使西礼夫特认错并陪礼道歉。

安源工人在大小数以百计的自发性斗争中，经受了锻炼，不断成长。然而，所有这些斗争，都由于没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—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始终不能取得胜利。但是，从以上所举的斗争事例中足以看出，安源工人是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；在他们身上，蕴藏着无穷的革命热力。所以，当一九二二年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——中国共产党组织

发展到安源以后，安源工人很快就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紧密地团结起来，展开对三大敌人的坚决反抗，从自发的斗争发展为自觉革命，踏上了为本阶级和全体被压迫人民谋求彻底解放而奋斗的革命征途。

拨开漫天迷雾 播下革命火种

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，为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，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。

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认识到，处于三座大山重压下的安源煤矿工人，苦难十分深重，要求改变非人境遇的愿望非常强烈；加之他们一万多人居住在一个矿区，消息传播迅速、联络比较方便，十分便于组织发动；而且安源工人大都赤贫如洗，除了出卖劳动力外，别无生计，故而大家利益一致，团结性较强。所以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成立伊始，就托人介绍，与安源路局火车房中的几个工人通信。随后，劳动组合书记部又不断将有关书报，以及各地劳工解放运动的消息传递到安源。安源各处墙壁上因此不断出现《工人周刊》等进步刊物。由于它们的传播和启发，安源广大工人开阔了视野，思想日益觉醒。

一九二一年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，毛泽东回到湖南，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（以后易名为中共湖南区委、中共湖南省委）书记，并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，大力从事工人运动的工作，积极领导长沙工人运动。湘区的工人运动因而得到蓬勃发展。

一九二一年秋、冬，毛泽东曾两次到安源考察煤矿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，传播革命真理。他多次下矿井、进工棚，走访矿工和他们的家属，交知心朋友，对工人的生产、

生活以及思想状况作了深入细致的了解，同时，对他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阶级教育，告诉他们：工友们受的痛苦，决不是命里注定的，而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结果；只要大家团结起来，就可以打倒剥削者，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。由于毛泽东能和工人打成一片。把话说到他们的心坎上。所以，当他离开安源返回湖南的时候，工人们都恋恋不舍地挽留他说：我们真舍不得你走！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毛泽东安慰工友们说：我有事情，不能不离开这里。我走了以后，会代表大家请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人来安源，给办个工人补习学校，长年跟大家讨论革命道理。

毛泽东回到湖南以后不久，果然派李立三等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。李立三后来回忆说：“毛泽东同志派我们到安源做工人运动的时候，他对于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，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，已经是胸有成竹。”又说毛泽东还告诉他们：安源工人众多，受到种种残酷剥削，生活特别痛苦，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。但是，应该看到，反动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，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。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，争取公开活动，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，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，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，建立党的支部，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。并且具体指示他们：为争取开展工人运动的合法地位，要首先从搞平民教育、开办夜校入手，从而把工人迅速地组织起来，团结在党的周围，并取得社会同情，以便站住脚根。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，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，把李立三介绍到了安源。李立三到安源以后，在安源工人朱少连、李涤生、周镜泉等